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民主党派

崔艳秋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玲

马宝珠

责任编辑：许 新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民主党派

崔艳秋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1,000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1006-9/K·141 定价：1.10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里的多党合作，主要是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主党派的合作。

我国现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为什么会有许多民主党派？为什么会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完全是由我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其人口来说，都在社会上占少数。在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着众多的农民阶级和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有软弱性的特点；小资产阶级似汪洋大海，有很大的散漫性。更由于旧中国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国家不统一，长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不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等，因此这些中间阶级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形成第三大党。它们中的不同阶层和集团在我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基于爱国、民主的要求和维护自身利益，逐步形成一些政治组织，因而在我

国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民主党派。

就这八个民主党派而言，它们大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建立的，同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的光荣历史，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这一重要论断，就是对民主党派走过的历史道路的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

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联合，于1948年1月在香港正式成立的政党。

早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前后，由于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持态度不同，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真心诚意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右派则持相反态度，他们反对或不执行三大政策，并

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北上不幸逝世后，左、右派分裂日趋明朗。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集团，终于在1927年制造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功败垂成。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从此与已经变质的蒋介石国民党正式决裂，高举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大旗，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开展了反蒋斗争。这些国民党左派就成了最早的国民党民主派。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民革的创始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武装侵略，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蒋介石统治集团，却坚持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镇压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对此，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甚为不满。宋庆龄、何香凝等纷纷回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民族危机也唤醒了一部分实力派和一度跟蒋介石走的人的爱国之心。在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后，他们奋起抗日，走上了与蒋介石公开对抗的道路。如1931年，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在黑龙江率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领导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和上海人民一起抗战；1933年5月26日，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公开违抗蒋介石的意志，同吉鸿昌等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这些局部

的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但最后却都被蒋介石所破坏,因而加剧了国民党民主派与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促成了抗日反蒋势力的联合,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在香港的李济深,召集了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袁墨林,以及由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于1930年8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代表黄琪翔、章伯钧、徐谦、陈铭枢,和自己的总参谋长张文等人,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秘密碰头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反蒋抗日,在福州发难,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会议结束后,各路代表分头行动,积极准备。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南校场正式举行了由29个省、市和海外华侨代表共100多人参加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早年曾跟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参谋总长等职。1929年,因反蒋被蒋扣于汤山,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才获释。从此,李济深坚决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遭到了蒋介石的镇压。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人,不甘屈服,于1935年夏,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继续从反

蒋抗日的活动，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终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局面。由于国难当头，更由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热情，国民党内的各民主派和爱国人士，打出了拥蒋抗日的旗帜。可是，自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蒋介石的态度骤变，从原来的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压制人民爱国力量，并从1939年起，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加紧迫害爱国民主人士，使得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当局日益不满和失望。为了加强斗争，国民党革命派王昆仑、许宝驹等，经与各方讨论酝酿，于1941年夏，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该组织改称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其中不少成员是中共党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的建立。

1943年2月，由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民主同志座谈会”，开始筹建第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民联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一年多的边筹备、边斗争，在重庆秘密举行。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章程》，选举了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杨杰、王昆仑、柳亚子、马寅初、于振寰、许宝驹、朱蕴山、何公敢等17人为中央临时干事会干

事，谭平山为负责人。

在民联组织筹备、成立的同时，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也在酝酿成立一个民主派的政治组织，这就是“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14日，民促在广州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中央理事会主席。民促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行动纲领。

民联、民促成立后，响应中共号召，分别在重庆、广州等地开展反内战、争和平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全面内战爆发前，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内，做争取中、高级干部，发展反蒋统一战线，和团结民主派的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他们一方面发表文章和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开展军事策反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为此，蒋介石十分恼怒，对民联、民促的活动不断施加压力。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竟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的戡乱总动员令，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大肆逮捕和杀害爱国民主人士。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公开镇压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运动，迫使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秘密出走香港。但是，蒋介石镇压民主运动的卑劣手段，不仅阻挡不了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相反，迫使国民党内的各种爱国民主力量进一步集结。由于斗争的总目标相一致，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面前，民联、民促逐渐产生了组织联合的意愿，以统一步调，增强斗

争力量。

1947年秋，在李济深、何香凝的建议和邀请下，民联、民促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陆续来到香港，为建立一个联合统一的政党组织积极筹划。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何香凝致开幕词，宣布民革的奋斗目标，是奉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恢复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等文件。成立宣言在历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后宣布，民革将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为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出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等16人为常务执行委员，李济深等71人为执行委员；选出柳亚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柳亚子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民革成立初期，分布在各地的党员约1000人左右，总部设在香港，北方、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分设支部。此外，由于斗争的需要，民革成立初期，民联、民促仍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公开决裂，使国民党反动势力更加陷于

孤立的境地。民革成立后，便积极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美蒋为了挽回败局，施用各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民革的一些领导人。当时，曾有人向旅美的冯玉祥表示，愿支持他回国组织新政府，条件是新政府不能让共产党参加。来者当即遭到了冯玉祥义正辞严的驳斥和拒绝。谭平山为此撰文，揭露美蒋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罪恶阴谋，要求民革成员再接再厉，为打倒蒋介石卖国政府而奋斗到底。

1948年3月，蒋介石导演了一幕“行宪国大”的闹剧。对此，民革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连续发文进行谴责和揭露，否定南京召开的伪国大和伪总统。

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后，民革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做了大量的军事策反和情报搜集工作，在一些地方还直接组织了军事行动小组，从而为加速蒋家王朝的覆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年9月和11月，民革先后发表了《告国民党将士书》和《告蒋管区内本党同志书》，呼吁广大爱国将士，迅速认清形势，脱离蒋介石政权，举行起义，为人民建功立业。在民革的号召下，担任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的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3个旅2万余人临战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加快了济南解放的速度，减少了人民的伤亡和解放军的

损失。在淮海战役前，李济深亲自派人做59军副军长孟绍谦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使孟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还有驻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新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和北兵团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在解放大上海的战役中，毅然率部起义，使解放军顺利地开进了苏州河以北的上海市区。民革的领导成员中参加起义的也不乏其人。如张治中策动西北国民党军起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程潜于1949年8月与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龙云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并策划云南旧部起义。

在搜集军事情报方面，民革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上海民革，就利用有人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之便，向中共提供了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的内容和兵力布置的情报。有些民革成员则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截取了奉化、广州和台湾之间的电报稿。有的利用国民党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处长的职务，取得了上海郊区500个碉堡的图纸。也有的民革成员抄录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名单。这些情报都先后交给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城市工作部，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

除此之外，民革在香港还举办游击队训练班，先后为广东输送了100多位基层骨干。民革上海和南京的地下组织还曾计划在南京发动一次有5000人参加的公开暴动，藉以破坏敌人的心脏，扰乱、动摇敌人的军心，因被特务侦破，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迎接解放，民革各地组织还发动成员成立各种群众性组织，如“中华自强协进会”、“联谊会”等，支援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发动成员参加中共领导的保护公共设施、护厂、护校等活动。当民革成员得知伪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存沪图书，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存宁古物等待移往台湾的消息后，立即想方设法阻止外运，致使当局仅运走了其中不及三分之一的文物、图书。类似的种种行动，为保护人民和国家财产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等，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赞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表示“极为钦佩”。

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在香港就召集新政协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随后，他们与中共一起筹备召开新政协。

1948年冬，应中共中央邀请，民革部分领导人首先进入东北解放区。随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350多人在中共南方局和在港中共代表的组织下，先后分20批，甩掉云集在港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避开港英当局的哨卡，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东北、华北解放区。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回国参加新政协的途中，因轮船失火殉难。民革的代表、曾任

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多年的杨杰，在前往解放区前，于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9年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提出了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普遍拥护。

1月22日，民革和已经进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等55人，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月27日，民革在沈阳又单独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进一步阐明民革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1949年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在和谈期间，民革领导人同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多次晤谈，为揭穿美蒋阴谋，争取和谈成功作了积极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全国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新政协选出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当选政府委员的民革成员有何香凝、李锡九、蔡廷锴、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等，李济深则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第一

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民革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担负起了新的使命。建国后，民革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参政、议政和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1956年2月，民革在京成立了以张治中为主任的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对台宣传。

四十年来，历史曾走过了一段弯路，十年“文革”的浊浪也冲击了民革。但是，民革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受了考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她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1979年10月和1983年12月，民革先后召开了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和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10年来，民革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包括积极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回归人员和去台人员家属的政策；面向社会开辟为四化服务的新领域，如举办业务教育，开展咨询服务，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以智力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积极开展同台湾、港澳和在国外的国民党爱国人士的联系，宣传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等。目前民革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主办了《团结报》。

民革自1948年成立至今，已走过了41个春秋。今天，民

革已经发展成为自己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她以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为己任，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二、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民盟是在抗日民主斗争的烽火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感召下建立的。

民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原始雏形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于40年代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

1931年，日本军阀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方针，继续热衷于内战。北大荒的枪声，“一·二八”的炮火，再次震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1935年8月，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救亡运动遍及全国。中国向何处去？成了知识分子渴望解答的问题。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在救亡运动的高潮中，1936年12月，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全面抗战，释放了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还设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机关。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开始改变了对蒋政策，从抗战初期的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而蒋介石则相应地由被迫抗战变为积极反共。1939年，蒋介石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动法令，发动了抗战之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蒋介石的挑衅，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三大政治口号，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各中间党派则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当时，尽早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建立真正的抗日联合政府的呼声，在中国知识界此起彼伏。

1939年10月，中间党派的参政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参政员，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就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年，国际形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准备扩大军事冒险；日寇急欲结束侵华战争，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和劝降活动；蒋介石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发动了皖南事变，对新四军进行突然袭击，使抗日部队遭受严重损

失。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揭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击退了反动派的反共逆流。就在这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关头，在周恩来关于联合各党派的建议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的政治纲领明确提出：第一，坚持抗日、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第二，结束国民党“党治”，实施宪政，实践民主；第三，尊重学术自由，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国民党党务活动；第四，反对一切特务机关。在民盟成立大会上，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不久，黄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主席。民盟成立后，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继续坚持在国民参政会内外的斗争。它的活动和它的影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

民盟是由六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的，它们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协会。

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初期其组织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松散的联盟。入盟各党派领导人是以个人名义参加，而他们所代表的党派仍是独立的政党，不受同盟决议的约束；其二，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同盟的成员尤其是领导人大多是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其三，具有阶级联盟的性质。参加同盟的各党派和一